

# 理解与阐释：考古出土文物展的语境构建\*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Contextual Construc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Exhibitions

赵 娜<sup>1, 2</sup>

Zhao Na<sup>1, 2</sup>

(1.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上海, 200433; 2.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成都, 610036)

(1. Depart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Museolog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Chengdu Jinsha Site Museum, Chengdu, 610036)

**内容提要：**与其他“博物馆物”相似，博物馆中的考古文物同样经历了从原生环境中抽离的“去语境化”过程，弱化了自我言说的能力，给观众造成理解障碍。只有为其重构脉络，再塑语境，才能促进理解的达成。诠释学语境论阐明了语境与理解的关系，为考古文物的语境化阐释提供了学理基础，将其贯彻于语境重构的全过程。即在考古学阐释阶段，通过关联文物感知和体验世界的多元语境，构建起全程、能动的物质意义网络，为展示环节的信息传播提供有力的语境支持；在展览阐释阶段，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维度的实践技巧完成考古文物的高语境转化，实现文物语境与观众语境的双重融合，最终促进观众理解的达成。这将是提高博物馆展览传播效果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博物馆 展览 考古文物 语境 语境化阐释

**Abstract:** Similar to other museum objects, archaeological relics in museums undergo a process of “de-contextualization” by being removed from their original environment. This weakens the relics’ capacity for self-expression and creates barriers to understanding for the audience. We can only encourage understanding by reconstructing and modifying the settings. Contextualism illust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ext and understanding,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In the stage of archa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a dynamic material meaning network is built through the various contexts in which archaeological relics view and inter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is network offers strong contextual support for the diffusion of information during the exhibition phase. In the exhibition interpretation stage, the high context transformation of archaeological relics is completed through the practical skills of macro, meso and micro dimensions. The simultaneous integration of the archaeological relics context and audience context is realized, ultimately promoting the audience’s understanding. This will be a fruitful endeavo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museum exhibits to communicate.

**Key Words:** Museum; exhibition; archaeological relics; context;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 本文系四川省文物博物馆领域科研课题“考古遗址本体展示信息阐释研究”（项目批准号：SCWW2022C01）阶段性成果。

将“物”从原生环境中抽离出来成为“博物馆物”，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博物馆的基础流程与内在逻辑<sup>[1]</sup>。这一“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过程使得物质资料变得孤立和陌生。只有为其重构信息脉络，再建易于理解的新语境，才能使沉默的物质资料重获新生。此为“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的过程。语境重构已成为博物馆展览信息阐释的有益尝试。尤其是在考古出土文物展中，由于其展示资料一般拥有相对完整的信息链条，可以构建出针对某一考古成果的情境叙事，语境化阐释的方法得以广泛应用。但在实际操作中，一方面在考古资料研究环节，由于缺乏对其语境关系的完整梳理，无法为展览阐释提供充足的支撑；另一方面在展览阐释环节，往往将语境化阐释简单理解为情景再现、复原陈列的展示方式，缺乏对展览中语境重构的实现途径进行系统分析，导致展示信息传播效果不佳。

针对以上问题，徐坚<sup>[2]</sup>、黄洋<sup>[3]</sup>、郑茜<sup>[1]</sup>、沈辰<sup>[4]</sup>曾就文物的语境研究进行梳理，严建强<sup>[5]</sup>、曹宏<sup>[6]</sup>、朱煜宇<sup>[7]</sup>就展览阐释中的语境重构类型与方式进行了分析，毛若寒则明确提出了语境化阐释的概念<sup>[8]</sup>，通过梳理博物馆学界针对语境的认知，对语境理念指导下的物的收藏、研究与展示方式进行了系统化讨论。上述研究从不同维度对语境化阐释的理论框架和实践策略进行了探索，但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一个关键问题便是语境与理解的关系，换言之，即语境为何能促进理解的达成，语境如何促进理解的达成。因此，本文拟从诠释学语境论出发，寻绎语境化阐释的理论依据，探讨理解与语境的关系，寻找语境建构促进理解达成的理论源头；讨论考古资料的语境化研究如何开展以及展览策划中考古文物的语境如何转化，以实现观众的理解这两个核心问题。本文试图回归语境作为一种理解方式的理论原点，通过剖析考古文物的语境构成，确

定其语境化阐释的目标，进而提出考古文物在展览中语境重构的实现途径，为博物馆展览的语境化阐释提供参考。

## 一、理论寻绎：理解与语境化转向

语境（context）一词从语义学来看，源自拉丁语动词contexere，词根texere有“编织”的意思，与代表“组成、共同”的前缀con组合起来表示“连接在一起”<sup>[9]</sup>。语境最初表示写作的行为，指将语言的各个部分组成有意义的话语或书面文本。随着语境思想的发展，人们对这一术语的指称逐渐转变为理解的延伸和决定其意义可能性的条件<sup>[10]</sup>。因此，作为一种理解的方式和条件，语境理念成为探讨理解与解释问题的诠释学（Hermeneutics）的重要概念。诠释学源于对神旨意的传达，在这一神话色彩之下，诠释学最初的含义是中世纪时期对圣经解释的原则。历经18世纪在语义学领域的发展，延伸出神学诠释学、法学诠释学、文学诠释学等“特殊的诠释学”<sup>[11]</sup>。经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狄尔泰（Wilhelm Dilthey）的奠基，诠释学成为一种普遍的关于理解和解释的理论，而后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及其继任者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笔下，诠释学经历了一场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根本转向<sup>[12]21-29</sup>。自此，诠释学研究的“文本”得以无限扩大，不仅包括语言文字和精神活动，也包括对艺术、历史和文化理解和解释。

语境的概念一直得到诠释学的关注，无论是方法论取向的诠释学还是存在论取向的诠释学，都将语境的构建作为“文本”解读的重要方式<sup>①</sup>。方法论取向的诠释学注重对语境的重建，强调将“文本”重新置于原来的历史语境中解读。而存在论取向的诠释学则提出“再语境化”的文本解读方式，即将

① 将施莱尔马赫以来的“普遍的诠释学”区分为“方法论的诠释学”和“存在论的诠释学”是目前的共识。“方法论的诠释学”的主题是如何获得对于“文本”的客观理解和解释，而“存在论的诠释学”强调理解是此在的我们存在的方式，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与我们的自我理解循环互动。见宋宽锋：《诠释学的两种取向与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天津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文本”置于自己当下的处境加以解读，或从自己的关切和问题出发进行解读可能具有的意义<sup>[11]</sup>。可见，语境是解释的出发点，它通过将陌生世界的意义关系转化到我们自己的世界中来实现理解。结合博物馆展览的信息传播特点，我们从诠释学语境论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 （一）理解的达成由语境限定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任何理解都不是一种复制性的原样理解，这里既有理解者的具体境遇和效果历史前理解，又有传承物本身经历的效果历史<sup>[12]</sup>。换句话说，理解的达成由阐释过程中的两方主体（被理解的物和进行理解活动的人）的语境所限定。对应到博物馆展览之中，则启示我们需要同时关注“物”的语境和“人”的语境。一方面物质资料的意义内涵于语境之中，博物馆需要将其还原到某一具体语境中，才能促进理解的发生；而另一方面，观众的理解受个人语境影响，个人语境即观众在参观展览前对解释对象带有的视角和期望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解者的个人视域，对理解活动造成影响。因此，只有实现双重语境的融合才能促进阐释的达成。

### （二）语境构建事物的多元意义

诠释学语境论认为语境是形成性的，具体的情况决定了解释的形式和方式，不同语境下“文本”的指称拥有不同的侧显，因而“文本”就有了不同的含义。阐释的实践就是不同语境的对话、交流和融合，进而从明显的意义中解读出隐蔽的意义，向人们展示不同的意义层次<sup>[13]</sup>。对应到博物馆展览，展览中物质资料的多层次意义是由其所处的不同语境决定的。考古学阐释的任务就是通过揭示物质资料的不同关联语境，传达物的多层次意义。另一方面，人的认识具有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成就了人理解的无限性，即“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的有限性与理解的无限性也为博物馆展览的故事编排提供了多样化的可能。

### （三）语境论蕴涵着整体主义思想

语义学常常强调要将语句放在上下文的语境中去理解，语境论认为任何事情必须在某一预设的语境、整体或“诠释学循环”中来理解<sup>[14]</sup>。对应于博物馆的阐释，一方面启示考古学的阐释要关注物的整体性，将物置于其完整的物质生命史维度考量；同时强调展览的建构需要在统一的大语境的限定下进行逻辑结构的编排，这一大语境可以对标为展览的传播目的，在展览中始终将这一语境进行贯彻和串联。

针对考古出土文物展，其语境化阐释包含两个阶段：一是考古资料由考古学家发掘整理，对文物进行语境化研究的阶段；二是将考古文物及其相关资料移入博物馆展厅，进行展览的语境重构阶段。结合语境论的启示，本文将就这两个阶段的语境化阐释方法进行梳理。

## 二、考古文物的语境构成

随着语境论思想进入物质文化领域，考古学阐释也萌生了语境化转向。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将语境意识视为考古学和古物学的分水岭，认为语境是考古学的真正主题<sup>[15]</sup>。基于对诠释学思想的吸纳，后过程考古学家将过去视为可以反复阅读的文本，而语境则是理解考古资料真正意义的关键所在，因此后过程考古学也被称为语境考古学（contextual archaeology）。在《阅读过去：考古学阐释的当代取向》一书中，考古学家将考古资料的语境界定为“围绕任何客体变量的相关维度的总和”，考古资料的意义则建立在“丰富的关联和对比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sup>[16]</sup>。

至于考古资料的语境构成，伦福儒曾提出以基质（matrix）、出处（provenance）和共生关系（association）构成语境的三要素<sup>[17]</sup>。可见，过程考古学的语境观主要聚焦于埋葬环境。到后过程考古学中，霍德提出物质的三重意义：一是作为参与事务、能源与信息交换的使用意义，二是用来传递结构或内涵的象征意义，三

是物质与历史的关联性及其所能反映出的观念转变背后的历史意义<sup>[18]</sup>。可以看出，此时得到完善的考古资料的语境至少包括功能性语境、象征性语境和历史性语境，通过对于不同埋藏语境的分析，揭示考古资料背后的思维、符号与行为的多重意义。行为考古学家迈克尔·希弗（Michael B. Schiffer）曾提出“系统语境”（systemic context）和“考古学语境”（archaeological context）两个类型，其中考古学语境可以理解为物品废弃后在埋藏环境的作用下形成考古资料的过程<sup>[19]</sup>。这一界定将物质资料的语境由“藏前语境—埋藏语境”扩充至“后埋藏阶段”，大大扩充了物质资料的生命史。近年来，关于考古资料语境构建的讨论也逐渐在我国展开，如徐坚、黄洋等学者，大多从考古资料的生命历程出发开展语境研究，但乏见对不同阶段的语境具体构成及其关联意义的系统梳理。

借鉴上述观点与诠释学启示，本文所理解的考古文物的语境研究应以物质资料为主体，通过关联其感知和体验世界的多元方式，构建起贯穿物质生命史<sup>①</sup>的意义网络。在具体操作层面，首先考虑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通过考古文物物理环境的改变可将其语境划分为原生语境与再生语境两个方面，进而考虑不同语境的关联人群，编织其携带的多元、能动的意义网络（表1）。

（一）原生语境

原生语境是指考古文物在生产、流通、使用、储存、埋葬废弃至“重见天日”前的各个环节的具体关联环境，这一阶段的关联人群包括考古文物埋藏前的生产者、交易者、使用者、拥有者以及埋藏后因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扰动的相关人群。考古文物在原生语境中主要携带三类意义语境。第一，物质语境。这一语境主要从考古文物本身物理表征出发，考虑其原料质地、生产技术、装饰设计、数量多寡、器型组合等相关环境与人群，分析其参与事务和进行信息交换的功能意义。第二，历史语境。这一语境将考古文物置于社会体系与结构组织中，通过联系相关自然地理、社会结构、经济贸易、文化传统、观念信仰等维度，揭示考古资料背后的社会文化与象征意义。考古资料的物质语境与历史语境相互交织，共同成就。以殷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铸造为例，开矿冶炼、制模作范、熔铜浇铸等技艺工序无不渗透着商代社会结构的分化与藏礼于器的文化观念，诡谲多变的纹饰或许还透露出商人神秘的信仰。第三，形成性语境。考古遗存形成过程中至发现之前经历的一系列变化的情景。因自然因素或人为因素，考古资料在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扭曲（distorted）<sup>[19]</sup>，对遗存原有的物理表征形态造成不同程度的扰动。形成性语境的加入揭示了考古埋藏扭

表1 考古文物的语境构成

| 物理环境 |       | 意义语境                   | 关联人群/事件         |
|------|-------|------------------------|-----------------|
| 原生语境 | 埋藏前一中 | 物质语境（物理表征与功能意义）        | 生产者、交易者、使用者、拥有者 |
|      |       | 历史语境（社会文化与象征意义）        |                 |
|      | 埋藏后   | 形成性语境（物理表征意义的改变）       | 自然因素、人为因素       |
| 再生语境 | 考古发掘  | 现实语境<br>（社会文化与象征意义的改变） | 考古学家等研究人员、社会公众  |
|      | 博物馆展示 |                        | 博物馆工作人员、社会公众    |

① 徐坚在《从金村出发：告别器物学，走向生命史》中，借助阿帕杜莱（Appadurai）的“社会生命”和科比多夫（Kopytoff）“文化传记”观念，首次提出了“物的生命史”这一概念。



曲和变形的过程，为考古学家科学完整地复原历史补充了条件，对深化理解文物遗存背后的人类行为提供了新的视野，同时也为下一步博物馆的阐释创造了链接。

## （二）再生语境

再生语境是指考古资料离开原生语境，由考古学家发掘研究、继而进入博物馆环境等一系列物理环境的变化导致的语境改变。在关联人群方面，现实语境中的考古学家、博物馆工作人员与社会公众取代了文物原生环境的关联人群，成为考古文物的研究者和解读者。由于跨越时间久远，产生了解释间距，考古文物需要同时在自身的年代和当今的世界中得到理解，因此其原生意义在现实语境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型和延伸。一方面，研究人员（如考古学家与策展人）受自身的视域影响，在还原考古文物的原生意义时会加入个人情境；另一方面，人们倾向于将考古文物视为某种特殊的符号，作为“历史见证的象征物”<sup>[20]</sup>，如贾湖骨笛进入现实语境中不仅被视作乐器，还被赋予了中国七声音阶起源的意义。而在过去与当下的频繁互动中，考古文物的意义还将继续延伸。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被作为中国文化遗产和成都城市的标志，成为一种符号象征走进公众生活。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考古学阐释的不同理论与方法，为考古文物建立起了丰富的意义立场，“阐释的目标并不是最终证明一种阐释，而是维持多种阐释，逐步存优汰劣”<sup>[16]</sup>。将考古学阐释置于一种无限的诠释学循环之中，也为下一步博物馆阐释提供了丰富的意义源泉。

## 三、展览中语境重构的实践路径

如前所述，博物馆展览阐释的达成由“物”

与“人”的双重语境所限定。通过对考古文物的语境梳理，为展览语境化阐释提供了广泛的意义支撑和多维视角。而进入展览传播环节，需要将观众的个人语境加入，思考怎样的语境转化可以实现观众的有效理解。而这将涉及观众的认知心理层面的活动。丹·斯珀波（Dan Sperber）在分析理解活动的认知语境时指出，个人语境包括其特定的记忆、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所构成的心理语境和社群知识、百科知识共有的知识语境<sup>[21]</sup>。这一结论似乎让我们了解观众认知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但斯珀波又提供我们一个关于认知共性的参考，即人的认知过程总是倾向于尽可能以最小的心力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因此，我们的目标便是寻找观众理解难度系数最小化的语境展示方式。

### （一）语境重构的目标：考古文物的高语境转化

明尼苏达历史中心博物馆馆长丹尼尔·斯波克（Daniel Spock）曾以展览对于原生环境的复原程度与观众的沉浸感为标准，提出了“高语境—低语境—反语境”的语境连续体（contextual continuum）模型<sup>[22]</sup>。其中高语境的展示方式对原境的信息还原较为丰富，对于观众的先验知识要求较低，因此很容易被观众所理解。福尔克（John H. Falk）的相关研究也表明，通过高度视觉化的方式展示古代历史，对观众的排他性较低，可以被广泛理解<sup>[23]</sup>。虽然二人将“高语境”的展示方式更多局限于情景复原的方式，但是这一概念<sup>①</sup>或能为展览语境重构提供目标借鉴。

高语境化的展示是指在展览策划中将考古资料的语境研究信息作为整体意义网络考量而进行高度还原的理念，它可以通过视觉、参与和符号等方式呈现<sup>②</sup>，意在降低观众理解的难度系数，实现阐释性信息的传播达成。在具体的展览策划流程中，高

① 高语境的阐释目标，详见毛若寒《试论博物馆的语境化阐释：内涵、目标与策略》，《东南文化》2021年第1期，第155页。

② 严建强在《作为公众媒体的博物馆——博物馆观众认知特征及传播策略初探》一文中对博物馆展览将物进行阐释的途径分为视觉、参与和符号三类。其中视觉指将展品，包括实物展品和辅助展品按照易于理解的方式陈列在展览空间中；参与指观众通过体验或者操作获得相关知识和感受；符号指采用常规的语词符号，观众通过阅读和聆听来理解展品意义。

语境化重构需要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不同维度的实践技巧贯彻,实现文物语境与观众语境的双重融合,最终促进观众理解的达成。

## （二）宏观层面：展览主题与框架的语境构建

从“基于物”到“基于语境”的理念转变为展览策划搭建了丰富的语境网络,展览的建构得以将文物置于更广阔的历史主题、运动和演变中,通过选取适当的语境视角,将考古文物有机嵌入特定的故事线,使孤立的展品之间建立起关联意义。观众可以通过展览语境搭建起与广阔社会的多重联系,从而在更整体的视野下观察和理解。

### 1. 转换语境为展览主题提供多元阐释可能

“基于语境”的研究,为策展人提供了探索不同视角、主题和声音阐释的可能性。以山西霸国墓地发现巡展为例,它先后在首都博物馆、澳门民政总署画廊、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以不同主题展出。在首都博物馆,策展团队从一件揭示了燕国公主远嫁霸国史实的青铜器入手,从考古文物的物质语境出发,以燕国公主的视角开启历史之旅。而在澳门展出时则以“正经补史”为主题,充分利用二重证据法,将器物、文献相互对应还原历史语境,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西周历史文化的窗口。金沙遗址博物馆以“发现霸国”为题,从考古发现这一现实语境切入,通过细描霸国发现的过程,拨开了萦绕在遗址中的层层迷雾。展览还以大河口墓地发掘领队为原型创作了卡通形象Uncle Xie和一位小男孩的形象。在整个展览结构编排上,通过两人一问一答强化考古发现的现实语境,激发观众探秘的好奇心。相同的发掘背景与考古资料,由于语境切口的改变演绎出了不同的主题与故事,同时也满足了公众多元的参观需求。

### 2. 不同语境交织搭建展览结构层次

单个大语境的选取为展览提供了整体的传播目的,而展览的结构层次编排则需要充分调动物质

的多元意义网络,通过多语境的编织搭建起故事线索,同时为观众提供建立相关性的不同突破口。

2021年,山西考古博物馆推出“燕姬的嫁妆——垣曲北白鹅考古揭示的周代女性生活”展以一件考古出土的媵器切入,从考古文物的物质语境(青铜器本身功用)出发,高度贴合观众的个人语境(婚嫁话题的现实相关性),合理演绎出远嫁的燕姬公主形象,并通过展览结构安排串联起考古文物背后的周代政治、文化尤其是婚礼、祭礼、宴礼等宏大的历史语境,整个展览不同语境的交织完成了考古文物从微观到宏观、从原生到现实的连接,实现了物与人双重语境的融合,推动了语境化阐释的达成。

## （三）中观层面：展示信息组团的语境构建

展览主题与框架之下,便是由不同信息组群构成的展览具体内容。它们以文物展品为基础,通过与其他非实物辅助手段的结合共同构建展示信息组团,成为展览叙事中观层面的基本单位。一个好的展示信息组团通常应传达一个清晰明确的语境,通过展示素材间的相互配合补充,搭建起观众与展品之间身体、认知和情感不同维度的沟通平台。

### 1. 活用文物的关联意义,增强展示信息组团的可视化

由语境串联起的文物意义关系网在展厅中由实物与非实物展品的组合形态呈现,组团涵盖的显性信息与隐性信息数量丰富,往往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语境。信息组团的再语境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文物直接置于情景复原之中,营造高语境场景,促成观众理解。另一类则是以考古文物为主体,通过活用文物的关联意义进行并置展示,辅以简单的辅助展品帮助观众通过联想、移情等方式达成理解。如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清冶铜华以为镜 莹光如水照佳人——馆藏铜镜特展”在展示铜镜的使用场景时,通过铜镜、执镜女俑、镜台、镜架等文物组合,搭配古代绘画中的梳妆图,还原出古代女子梳妆打扮的情景。这一语境构建的方式虽没有进

行大面积的情景再现和动态演绎，但通过巧用文物语境的信息关联，结合图文版面大大增强了展示的可视性，同时调动观众思考联想，在脑海中完成了语境的还原。

## 2. 构建多感官的情景复原，增强语境的体验感

情景复原是展览语境化构建中最常见的展示方式，而单一静态的场景再现已逐渐引起观众的视觉疲劳。场景中蕴含着纷繁复杂但饶有趣味的信息，静态的复原往往将观众隔绝在历史语境之外，观众犹如无关紧要的旁观者，难以触发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因此在情境复原中，要善于使用多感官的媒介，调动展示要素与观众身体、认知和情感的多重关联，使观众成为场域的一部分，在互动参与、沉浸合作中完成与历史和考古的连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在“九连墩的故事——湖北九连墩楚墓精品文物特展”中设计了集楚国宴乐场景复原展示与社教活动为一体的“楚风体验堂”专区，在这里观众仿佛穿越至两千多年前的楚国，眼观宴乐图动画，耳听编钟美妙悠扬的乐音，在推杯换盏间体验着楚国贵族的生活，而宴饮礼仪、社会分化等历史信息在观众体验中完成了传达。

## （四）微观层面：聚焦于单个文物的语境构建

作为展览中的最小单元，单个文物的语境是指其从属的物质性与精神性整体，不仅是对文物环境或背景的重建，更是指对文物内涵和意图的表达。

### 1. 关照现实语境，增强文物与观众个人语境的相关性

实物展品作为博物馆传播的核心介质，是观众最为关注的展示要素。因此，对具体文物的语境构建需要特别关照观众的个人语境，寻求展示信息与观众的相关性，为观众创造有意义的个性连接。此时文物的现实语境便显示出独特功能。跨湖桥遗址

博物馆在展示遗址出土的釜甑等炊具时，将生活中常见的蒸锅投影在旁，通过古今对照使观众知晓釜甑的功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在解读太阳神鸟金饰时，从由太阳神鸟金饰原型演变而来的成都城市标志入手，通过随处可见的城市标志物拉近了观众与文物的距离。

### 2. 情境式的展品标签，营造文物的最小场景

展品标签是文物展示中必备的要素，是仅次于展品的聚焦点。以往的展品标签或是简单的出土年代信息标识，或是长段艰涩难懂的术语，对于文物的原生语境和再生语境经历很少涉及，不仅对观众的阅读造成障碍，更难引起观众的阅读兴趣。展品标签的文字要求较为苛刻，但仍可通过情境式的表达引人入胜，为展览营造出最小的场景。金沙遗址博物馆“霸——迷失千年的古国”展中一件温鼎的标签就别具匠心。

#### 夔凤形足温鼎（西周）

热饭的器具。西周时期，人们一天只吃两顿饭，上午9点为“朝食”，下午4点为“晡食”，一般是把早上的剩饭热热吃就行了。但是热饭用什么工具呢？用鼎，杀鸡焉用牛刀？用甗，费时太长。因此这类温鼎便出现了。在上面小鼎里放食物，下面的盘里放点着的柴，短时间就能把食物加热了。

这段标签文字首先开门见山地点明了器物的功用，而后用寥寥百余字将古人发明温鼎的情景进行描摹，其间还交代了西周的饮食文化，一幅古人用温鼎加热食物的场景便浮现眼前。

从诠释学语境论出发为考古出土文物展的语境化阐释寻绎学理支撑，本文仅是一个粗浅的尝试。必须承认，仍有一些问题亟待厘清。如考古学阐释中，考古学家同样面临自身语境的限定或自由，考古学阐释应如何应对或应用这一特定语境，在展览阐释中，如何通过语境重构促进观众积极的意义建构。笔者将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探索。

## 参考文献

- [1] 郑茜. 作为方法论的民族文物: 民族文物价值认知的方法论意义初探[J]. 博物院, 2019(4).
- [2] 徐坚. 从金村出发: 告别器物学, 走向生命史[J]. 文艺研究, 2020(12).
- [3] 黄洋. 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信息诠释与展示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4: 106-110.
- [4] 沈辰, 商阳子. 试论“物”的能动性及其在博物馆藏品研究中的应用[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22(5).
- [5] 严建强. 论博物馆的传播与学习[J]. 东南文化, 2009(6).
- [6] 曹宏. 博物馆展览叙事语境的构建[J]. 博物院, 2021(6).
- [7] 朱煜宇. 博物馆陈列语言之情境构建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4: 69-101.
- [8] 毛若寒. 试论博物馆的语境化阐释: 内涵、目标与策略[J]. 东南文化, 2021(1).
- [9] 徐坚. 时惟礼崇: 东周之前青铜兵器的物质文化研究[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87.
- [10] DILLEY R M. The problem of context in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J]. *Language & Communication*, 2002(22): 442.
- [11] 宋宽锋. 诠释学的两种取向与哲学史的两种研究方式[J]. 天津社会科学. 2021(1).
- [12] 洪汉鼎. 诠释学: 它的历史和当代发展[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3] 保罗·利科尔. 存在与诠释学[G]//洪汉鼎, 主编. 理解与解释: 诠释学经典文选.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1: 256.
- [14] 杜建国. 语境论与哲学的诠释转向[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5(3).
- [15] RENFREW C. Loot, legitimacy and ownership[M]. London: Duckworth, 2000: 11.
- [16] 伊恩·霍德, 斯科特·赫特森. 阅读过去: 考古学阐释的当代取向[M]. 徐坚,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196.
- [17] 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 考古学: 理论、方法与实践[M]. 第6版.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32.
- [18] PEARCE S M. Interpreting objects and collections[M]. London: Routledge, 1994: 12.
- [19] SCHIFFER M B. Archaeological context and systematic context[J]. *American Antiquity*, 1972(2): 156-165.
- [20] 安德烈·德瓦雷, 方斯瓦·梅黑斯. 博物馆学关键概念[M]. 张婉真, 译. 巴黎: 国际博物馆协会, 2010: 62.
- [21] 丹·斯珀波, 迪埃珏·威尔逊. 关联: 交际与认知[M]. 蒋严,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5.
- [22] SPOCK D. Museum exhibition tradecraft: not an art, but an art to it[G]//MCCARTHY C.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s of museum studies. New Jersey: John Wiley& Sons, Ltd, 2015: 386-390.
- [23] FALK J H.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of family visitors in natural history museums[J]. *Curator*, 1991(1): 44-57.